

鲜活与枯寂

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

● 刘振生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鲜活与枯寂

— 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

● 刘振生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鲜活与枯寂：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 / 刘振生著.—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601-6276-8

I . ①鲜… II . ①刘… III . ①近代文学—文学史—研究—日本
②现代文学—文学史—研究—日本 IV . ①I31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6390 号

书 名：鲜活与枯寂——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
作 者：刘振生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张树臣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60 千字
ISBN 978-7-5601-6276-8

封面设计：张沐沉
长春市泽成印刷厂 印刷
2010 年 8 月 第 1 版
2010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本书为大连民族学院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序

日本对于中国来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黄河之水通江户，珠峰连着富士山”（郭沫若语）一直是我们的情感选择和美好期待。那山、那水、那花、那人，对我们或许十分熟悉、非常向往，但当我们真正谈起时，往往表现得比较模糊、疏离。

日本文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陌生而神秘的存在。说它陌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中国人知道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的恐怕远不如日本人了解鲁迅、老舍；说它神秘，大家又知道日本竟然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其中，川端康成在获奖四年后自杀，完成了只属于大和民族的东方文学中的“绝响”。而大江健三郎却通过个人的“苦斗”，在寻找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点，并不断与中国文学家（莫言）对话。村上春树文学的出现，似乎又开始质问：“他们到底代表了什么，还是没有代表什么？”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或者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之所在。日本文学中许多文学形式、人物形象是“生动”而“鲜活”的，但在其背后往往表现出“枯寂”、“物哀”的特殊民族审美情趣。通过对日本文学的学习、研究，使我们对日本、日本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也可以排斥因政治、军事、经济的对立，而带来的文学、文化交流上的扭曲、干扰，进而形成对文化的正面理解。从文学本身来说，“文学应该是从人类的暗处去发现光明的一面。小说写到最后应该给人一种光明，让人更信赖人。”（大江健三郎语）。

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不仅与其母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还同中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中有推动中国近现代文学前行的作用力，也有阻碍中日文学正常交流、健康发展的反作用力。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理性

地看待因中日关系的复杂性而导致两国文学介绍、交流上的震荡与波动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能因为政治、军事、经济的共时性特征，而忽略或抹杀其文学的通时性特征。

拙著是笔者对十余年近现代日本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一次概括和总结。其中偏重于对新现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社会派等的研究。文中首先梳理了近现代日本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其次论述了近现代日本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家、经典作品；然后归纳出了近现代日本文学的特点以及与中国的关系；最后谈了日本文学史课程与日本文学作品选读课教材的建设等问题。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的叙述和思想的袒露的话，那么文学翻译、文学研究就是与作家在进行心灵的对话、思想的交流，但愿我的一些努力可以实现这一尝试。

笔 者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扬弃”与“发展”——日本近现代文学
史论 (1)**

**第一节 从“劝善惩恶”到“真善美”
——明治初期、中期的文学 (3)**
**第二节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明治末期、大正期的文学 (9)**
**第三节 文学的“政治化”与作家的“贞操观”
——昭和期的文学 (13)**
**第四节 “国际化”背景与“自我疏离”状态
——平成期以来的文学 (16)**

**第二章 “接合”与“断裂”——日本近现代文学
流派论 (19)**

**第一节 政治与文学的“纠结”
——近现代文学流派演变史略 (21)**

第二节 “源”与“流”	
——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的嬗变 (33)
第三节 人道主义与“空想”	
——白桦派作家之创作轨迹 (38)
第四节 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游离	
——新思潮派文学特征 (42)
第五节 “生动地，有力地”	
——对新感觉派的“感觉” (45)
第六节 对军国主义的批判与再认识	
——战后派作家群像 (49)
第三章 “开化”与“守护”——日本近现代作家	
论 (55)
第一节 革命文学的激情演奏者	
——小林多喜二 (57)
第二节 为农民呐喊的无产阶级反战作家	
——黑岛传治 (66)
第三节 理想·正义·和谐	
——点描社会派作家石川达三 (69)
第四节 对“中国大陆”的那份执着	
——井上靖的创作舞台 (75)
第五节 “社会派”文学的传人	
——山崎丰子 (80)
第六节 “残缺”与“自我救赎”	
——大江健三郎创作中的母题 (84)
第七节 “欧美情结”与“中国之路”	
——村上春树的文学使命 (90)

第八节 “佛理”与“禅机”	
——近代日本作家的文学元素 (93)
第四章 “质朴”与“浮华”——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论 (99)
第一节 夏目漱石中期创作三部曲	
——《三四郎》、《其后》、《门》 (101)
第二节 “消亡”与“永远”的第一次吟唱	
——《老年》 (108)
第三节 在希望与不安之间徘徊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世界 (117)
第四节 异样的东洋“美”与“丑”	
——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 (124)
第五节 对青春的鲜活记录	
——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 (131)
第六节 当“众生”成为“上帝”的瞬间	
——大冈升平的《俘虏记》 (134)
第七节 走向“炼狱”的边缘	
——石川达三的《最后的世界》与其道德观	... (139)
第八节 “裂变”与“毁灭”	
——《青春的蹉跎》中江藤贤一郎之性格 (147)
第九节 源于“堕落”的交际	
——石川达三的《洒脱的关系》初探 (152)
第十节 社会派文学创作之坐标	
——《金环蚀》与《华丽的家族》 (157)
第十一节 “反思”与“求索”	
——战后日本中、短篇小说五十年(1946—1995) 述要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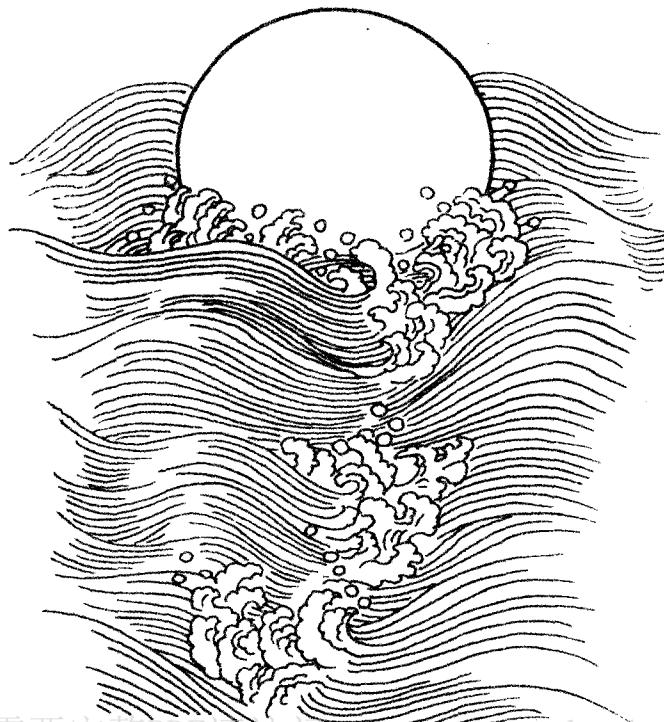
第五章 “拥抱”与“占有”——日本近现代文学与中国 (173)

第一节 “越境”与“雄飞”	
——甲午、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文人与东北	... (175)
第二节 黑土地上的“樱花”	
——日俄战争后东北日本人作家与创作 (191)
第三节 “亚洲主义”的风景	
——横光利一的《上海》 (198)
第四节 面对“正义”的坦诚	
——抗日战争文学中日本人的“反战文学”	... (202)
第五节 “真实”与“虚构”	
——竹内好与太宰治笔下的“鲁迅” (209)
第六节 “拓荒”与“辍耕”	
——我看《日本文学》杂志 (213)
第七节 从“注释”看“文化”	
——日本文学翻译漫谈 (218)
第八节 “系统地，宽泛地”	
——日本文学史课程建设谈片 (228)
第九节 “重点地，深入地”	
——日本文学作品选读课教材建设之管见 (234)
跋 (243)

第一 章

“扬弃”与“发展”

—日本近现代文学史论



第一章

“扬弃”与“发展”

——日本近现代文学史论

第一节 从“劝善惩恶”到“真善美” ——明治初期、中期的文学

近世日本社会在时间上是指 1603 年至 1867 年的江户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构成具有其他时期所没有的特殊性，即存在着双重的社会势力，一个是掌握着政治权力的武士阶层，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另一个是掌握着经济命脉的町人阶级，他们在经济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者倾向于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理想主义，后者，尤其是町人大众则提倡现世主义。在这两种时代潮流的交错中，以儒教为中心，佛教、神道也汲取儒教思想之精髓，进而形成儒教、佛教、神道教三教一体的宗教结构。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就是，“性爱主义”文学思潮和“劝善惩恶”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了对立与交合，并成为这一时代日本文学的主流。

近世日本文学的主流思想在于将文学作为载道之器、修身之本。当然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含有道德要素的现象是自古就有的。早在圣德太子^①制定《十七条宪法》时，中国的“文以载道”之说就与佛教一起传入了日本，并加以发扬光大。圣德太子以“和”的精神，调和了儒佛思想，作为君臣之道，显示其所含的道德精神。如叶渭渠所言：“近世儒学者以儒学的道德和新儒学性理说作为‘劝善惩恶’思想的基础，以通俗的语言来解释道德和教训，所以比较容易为小说家、庶民读者所接受。‘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的教诲精神深入人心，并且运用到当时的小说和戏曲创作之中。”^②

近世小说和戏曲作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一方面贯穿“劝善惩恶”思想，一方面以“娱乐”作为表现手段，通过娱乐读者以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这种以“劝善惩恶”思想和娱乐形式为根底的文学论，多见诸于作品的序跋或种种评论之中。尤其是近世后期，宽政改革^③给商业主义文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强化了以功利为目的的文学观，更加盛行以“劝善惩恶”作为小说的目的观和价值论，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劝善惩恶”文学理念的发展。

戏文是近世小说和戏曲的新模式，包括假名草子和浮世草子等俗文学，与传统文学，如和歌、和文等雅文学相对照。这种雅俗区别，不仅由于作家的阶级身份，如贵族阶级、武士阶级和町人阶级的不同，思想感情的不同，作品素材的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文学价值认识的不同。戏文的文学模式是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虚假荒诞的内容，二是通俗语言的表现，三是以宣扬因果之理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它综合了佛教“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世界观、通俗的戏作技法和儒学的“劝善惩恶”的目的价值论。这种文学形式通过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④ 得以完成，成为近世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劝善惩恶”文学思想是符合近世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适应在文学上反映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新儒学而产生的，因而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

^① 圣德太子（574—622），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出使中国，修建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法隆寺，推行中国的政治管理制度等，对日本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② 叶渭渠著：《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48页。

^③ 德川幕府后期，老中（执政官）松平定信主持进行的一次政治、经济改革。在文化思想上，奉朱子学为官学，设立昌平学堂为官立学问所，禁止其他儒学派别的发展。

^④ 即浅泽马琴（1767—1848）的代表作，又称《八犬传》。读本（章回小说）。日本最长的小说，共9集98卷，106册。刊行于1814—1842年。讲述了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命名的八个犬士，为里见家东山再起立下汗马功劳，后隐居富士山，得道成仙的故事。

性，也有违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特点。首先，它没有正确处理好文学的教育、认识和审美的三个功能意义，过分夸大教育功能的作用，而且将教育的功能性仅限于道德教育，而无视其他方面，尤其是审美教育功能方面，也就轻视了文学本身所具备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其次，没有正视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道德的载体，形而上地对待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辩证关系，分割了真善美三者不可分的统一性、互动性。再次，没有将文学放在应有的地位，将文学视为无益的游戏，从而降低了文学应有的品位，削弱了文学本身的价值意义。

日本文学从近世走向近代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即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在这一时期，首先是抗拒“劝善惩恶”文学思想，呼唤人性的凸现和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坪内逍遙作为近代文学的鼻祖，于1885至1886年完成了文学评论《小说神髓》，提出以“真”作为唯一的文学理念，从而与以曲亭马琴为代表的主张“善”为唯一的文学理念相对抗，强调小说首先是写人情，其次是写世态风俗，与“劝善惩恶”文学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即“与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中所看到的儒教意义的人的形象相反，逍遙所新发现的是那种大胆地肯定人的‘情欲’的人的形象。”^①同样，坪内逍遙还批评了近世的“劝善惩恶”文学观过于强调小说的教育功能，将“劝善惩恶”作为小说的眼目。由于劝善这种表面的名义难以割舍，于是加进一些劝善的主旨来曲解人情世态，从而编造出一些生硬的故事情节，无法满足更多民众的精神需要和心理需求，使文学走向了单纯说教的歧路，丧失了文学本身的魅力。

日本文学由近世向近代转型不是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不应该将日本文学的近代化完全等同于西方化。在日本文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尽管西方近代文学在文学发展的选择中是一种非常活跃的因素，但日本乃至东方文学的传统思想和传统形态仍然是其实现现代化的根基，是其文学近代化之保持其民族特色和东方特色的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文学的近代化不是完全西方的或者说西化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地道的日本民族特色及东方文化韵味。

回到近代日本的开化来看，其近代思想启蒙及维新变法是基于以明六

^① 红野敏郎等编：《明治的文学》近代文学史1，东京：有斐阁选书，昭和47年6月20日第1版，第31页。

社^①的森有礼、西村茂树、福泽谕吉、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等人的影响与推动的结果。而在这个接受启蒙的社会底层，依然流行着江户时代小市民文学的传统血脉。由于明治维新^②并不是自下而上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仍旧停滞于以前的状态，这就成为“旧游戏文学”^③的社会基础。这种属于江户末期的人情小说、滑稽小说系统的旧游戏文学在新的政治小说或翻译小说出现之前，一直保持着它们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这种明治初期的游戏文学，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是旧时代的延续，只是它的素材取自随着西洋物质文明的输入而产生的社会新风俗新景象而已，完成的作品大多数为走马观花的描绘。

回首近代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它是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之一，以获得现代的自由为目标，从庶民下层进行的思想斗争。1880 年起，在福岛、秩父以及日本全国燃起的革命烈火长达五年之久。但由于明治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收买，最终遭到失败。另一方面，明治初期处于一个政治启蒙阶段，这种来自下层的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和斗争，与明治政府动员开明的官方思想家从上层开始的洋化妥协政策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合、互动的效应。当然，来自上层的启蒙运动，也在必要的程度上接受了来自下面的要求，并加以利用和推行。从这一点来看，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们很快就采取了怀柔政策，从而最终把来自底层的运动和诉求完全抛掷一边。正是这两个因素相互矛盾的过程，决定了近代日本乃至文学的发展轨迹。如西乡信纲所言：“这一时期的文学改良运动，反映了当时来自上层的启蒙运动以及改良性的洋化妥协政策。同启蒙时期相适应的这种文学改良，以模仿西欧的诗、创作新体诗开始，进而扩展到改良小说，改良文体，改良戏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④

^① 明治 6（1873）年创立的思想启蒙团体，发行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法律、文学、教育等，鼓吹欧化思想，宣传自由主义，1910 年解散。

^② 1867—1868 年发生在日本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由幕府德川庆喜将军将政权交还给天皇，标志着新政权的成立，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关于明治维新，国内学者王晶认为，从贝利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万峰认为，1869—1911 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

^③ 泛指江户时期出现的以小说为主的通俗文学，主要有洒落本、滑稽本、黄表纸、人情本、读本等。以宽政时期（1789—1801）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家主要有上田秋成、平贺源内等；后期主要有山东京传、十返舎一九、曲亭马琴等。

^④ 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 3 月第 1 版，第 234 页。

如前所述，在文学启蒙与改良运动中，作为近现代文学的直接推动力是坪内逍遙的文学评论《小说神髓》与二叶亭四迷的文学论著《小说总论》。在这两部评论问世前，也有过一些启蒙性文学理论，如西周的《知说》、维龙^①的《美学》等，但只限于介绍西欧文艺理论。《小说神髓》强调文学主体性，否定旧的封建式的“劝善惩恶”的创作思想，提出文学艺术就是形象地认识现实的观点，倡导朴素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文学就是要表现现实的人，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在理论上明确了近代小说的写实主义精神。二叶亭四迷在坪内逍遙文学理论影响下，以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为基础，完成了《小说总论》，其思想核心与《小说神髓》相同，反对“劝善惩恶”，主张现实主义，并通过他的创作实践，即发表长篇小说《浮云》^②，宣告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始。从《浮云》第一次运用“近代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与近世文学相背叛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使文学从一般意义上进入了近代。

《浮云》成功地描写了当时在腐败的半封建明治官僚政府的专制统治下，一个平凡而善良的近代知识分子，在人生成长的初期就遭到残酷蹂躏的过程。它是一部崭新的近代现实主义小说，和《当代书生之气质》^③这样的非现实主义作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既可以说是自由民权运动在文学上取得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作者那种高度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物。《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从学校毕业后就当上了政府机关的办事员。他是一个懦弱但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下去的人，对于把所有发展个性的道路都封锁起来的明治官僚社会，始终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与此相反，文三的朋友本田升是一个没有廉耻的典型的官僚。对上司不肯卑躬屈膝的文三，终于被撤职，失去了工作。文三的恋人阿势因为她母亲阿正的强势和个人打算，眼看就要被因善于阿谀奉迎而升了官的本田升夺取了。对“西洋主义”有所了解的阿势，并不理解被撤职的文三的本质究竟是好还是坏，而逐渐对本田升有了好感。作者在这里通过对“只是从外表上看人好坏”的阿势的性格描述，批判了从上层进行洋化的肤浅和弊端所在，揭示了明治维新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① 维龙 (Eugene Vermann Lotze, 1825 – 1889)，法国资产阶级美学家，曾任报社编辑和记者。

^② 该作品尽管是“言文一致”的新文体，但仍有相当程度的戏作文体的残存。根据有关资料介绍，作家主要参考了三游圆朝的“人情话本速记”和式亭三马的“滑稽本”。

^③ 创作于明治 18 – 19 年。近代小说的过渡时期作品。在具有江户时期的戏作小说特点的同时，加上了西洋小说的写实性。